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日出版）

本期目录

【盖棺论人】	教科书一般的人生经历：聂元梓的九十八年	老 田
【各抒己见】	聂元梓是一本怎样的书？	舒 声
【痛定思痛】	我出卖了我自己	金敬迈
【人物追踪】	四川文革“风云人物”沉浮记	老 吴
【乱世人生】	戈华冥诞百年祭（下）	樊能廷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盖棺论人】

教科书一般的人生经历：聂元梓的九十八年

• 老 田 •

在过去一百年内，中国经历了变革幅度最大的历史震荡，恰好，聂元梓都作为亲历者认真参与其中了。正是从个人与历史的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她教科书一般的经典人生。

毫无疑问，聂元梓最初亲历的是中国革命岁月，她作为具有爱国情怀的青年学生，参与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新中国成为高级别干部。这是她人生中间第一个重要时间段。在《聂元梓回忆录》中间，她追述了自己参加共产党领导下革命队伍的经过，在那个“北平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年代，她寻找一个能够打日本队伍加入。

1935年国民党与日寇签署“何梅协定”之后，党国的军警宪特退到保定以南，深怀抗日热情的青年学生大多对国民党政权绝望了，希望有一个真的打日本的力量可以加入。到了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北平真的已经摆不下平静的书桌了，大批青年学生撤出平津寻找抗日道路。正是这个时候，共产党人完成了长征到了北方，在平汉铁路各站，共产党人摆上一张木头桌子，派出人员招募抗日青年从军。据聂元梓回忆，最初与她接洽招募事务的是程子华，而与聂元梓一道受招募的三位小伙伴，都十分抓紧这个被招募的机会，唯恐被扔下了，几乎到了要紧跟盯人的程度。

新中国成立之后，聂元梓作为高级别干部，亲历官场的蜕化变质过程，她自己第一次不幸婚姻，就源于小三追求“大干部”的排挤效果。她作为女性，首次从这样的视角，深切地体验到了革命第二天的一般性问题。在她的第二次短暂婚姻中间，她被带到了共产党最高层官员的生活圈子，亲眼目睹了中组部长的交往圈子及其腐朽堕落的淫乱生活，她对此的反感是不言而喻的，还从阶级斗争和特嫌角度向康生汇报了自己的发现。

在1964年开始的北大社教运动中间，她受到工作组的启发和动员，起来揭露北大官场的问题，就此被官场打入另册，1965年两次国际饭店会议中间备受打击和批判。到了文革前夕，北大官场已经预备把聂元梓放逐农村，驱离北大了，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她看到了《五一六通知》的传达精神，同时也预备做一次鱼死网破的抗争，这才是她参与那张著名的“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由来。

在共产党人的政治传统中间，群众路线和批判与自我批评，是一个很大的创新，同时也是一个对传统政治生活的巨大颠覆。按照老田的看法，这样的政治实践是一个打开封闭政治空间的革命性举措，是极大地缓和政治不平等以及权力封闭性的革新，传统的等级关系以及下级依附并服从上级的政治关系，相当大程度被缓和了。上级垄断权力和决策机会的封闭性，相当程度打开了，下级或者群众可以依据自己掌握的信息或者诉求，参与决策过程和权力运作过程，甚至还可以对上级进行周期性的“反批评”（整风），这个变革，老田称之为“私人领域公共化”。

在根据地年代，私人领域公共化的革新措施，一定程度上能够得到长官的尊重，因为没有下级和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一切都玩不转。但是，到了执政之后，长官一个人垄断机会分配同时经营小圈子，就成了官场风气。北大官场一样如此，即便是上级派来的工作组，想要了解一些真实情况，也不得不深入动员和拉拢“积极分子”，北大官场此种小圈子经营带来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状况，甚为普遍；而工作组为了打开局面，也不得不费心费力去经营另外一个小圈子。以第二个小圈子，去揭示第一个小圈子的问题，这个恰好说明官场的真实状态，究竟是怎么样的。

在革命后年月，革命年代的私人领域公共化趋势，被逐步终结，官场的小圈子封闭程度加深，“跟人而不是跟路线”成为聪明人的首选，宁可犯政治错误、不可犯组织错误成为官场铁律，正是依据这一的新标准，聂元梓才被认定为“异己分子”和不可靠力量，成为需要彻底放逐的人。在文革后，聂元梓这一段经历被说成是十恶不赦的坏人坏事，但是，从中国革命的旧传统和共产党人的明示规则来说，聂元梓的说法很对。但是，做得对的，为什么反而吃不开，这才是文革所揭示的根本性问题所在。

北大四清运动的反复，工作组第一批动员的积极分子，面临着被反攻倒算的命运和风险，在这个过程中，各路人马都有自己的选择和表现。象聂元梓这样，不愿意后退与妥协的是一批人，除了她之后还孙蓬一、郭罗基等人；也有人及时地转弯子，进行一百八十度转向，想要重归旧章，再找个位置坐回去，例如著名的季羨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聂元梓在回忆录中间，没有清晰讲述她在两次国际饭店会议中间受到那么大压力，为什么还继续拒绝退步。看起来，聂元梓作为女性革命者和高干，早已经有了对于官场的潜在批判意识，她之所以成为工作组的积极分子，后来又拒绝后退以保全自己，应该说这是她愿意遵从的“本心”——她自己对于官场的批判是内在的而非外在的。以至于被陆平等入彻底划为“界外”预备放逐她下农村去，她依然没有选择后退和求饶，而是在文革初期参与署名第一张大字报，这原本是要选择一次“殊死反抗”，很有点破罐子破摔的味道。在这个问题上，聂元梓身上确实存在着继续革命的内在动力，或者潜意识里已经有了想要终结官场腐朽黑暗面的追求，正因为如此，她才坚定地选择向前。

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这张大字报的内容，聂元梓回忆说自己也极感意外，她追述当时的感受是“脑袋发懵”——自己也闹不清是怎么回事。但是，这件事肯定对她有利，把她从极端不利的状况下解放出来了，这一点倒是清楚的。

正是因为此种力度的支持和宣传，聂元梓有了一笔在无意之间积累下来的政治资本，所以，她后来在新北大校文革中间担任了一个重要角色。那些在国际饭店会议中间不妥协的积极分子，现在近乎有了英雄的地位，成为人们称赞和膜拜的对象。但在另外一个方面，那些在国际饭店中间妥协过的人，对照下来，则近乎有了“当叛徒”的不光彩，从这样的心理出发，就格外需要彻底抹黑和打压聂元梓的需要。就这样，著名的季羨林先生参加了对立派“井冈山”，说他们自己才是“更造反”“更革命”的一方，直到1990年代季羨林书写的回忆录的里面，依然象泼妇骂街那样恶毒咒诅聂元梓和她们那一派，却没有讲出为何如此的道理。

文革大潮兴起之后，每一个人都在重新找寻自己的位置，同时也想办法以损害他人位置为条件去提升自己。在这样的恶性政治竞争中间，聂元梓缺乏把控能力，也未能在需要她发挥正面引导作用的时候，起到相应的作用。虽然被合称为“五大学生领袖”之一，但是，这些领袖们确实没有能够很好地履行领导责任。北大和清华，作为全国著名学府都陷入恶性政治竞争，以至于最后升级到武斗。在两派的辩论中间，每一派都竭尽全力抹黑对立派，各种语言暴力有增无已，1968年毛老人家在接见五大领袖时，用开玩笑的口气复述了北大两派的辩论策略：井冈山一派说聂元梓哥哥姐姐都不是好人所以她也不好，而新北大一派提出“杀牛、宰猴、断羊腰”。据谢静宜回忆，毛爷爷私下里对北大清华的状况极端不满意，措辞更是相当刻薄，甚至有“不知羞耻”的字眼。

应该说，北大和清华的文革走到两派尖锐对立和武斗的地步，业已形成了难于共存的僵局，毛爷爷在接见时开玩笑说要不“斗批走”“斗批散”、北大清华都一分为二，两派各自组成一个大学算了。此种严重状况的出现，实际上已经预示了“利维坦”的迫切需要，以及造反派从现实政治中间出局的后果。正是在同一次接见中间，周总理、康生等人开始狠批造反派组织的“北航黑会”，这预示着未能够完成基本政治整合、实现团结大多数的造反派力量，已经被视为恢复秩序的负面力量了。

今天回顾，北大和清华的那种状况出现，确实不是一般人能够应付和解决的，聂元梓当时有着较高地位，却未能对此作出改变，因此，领导能力不足的判断是成立的。至于文革后说聂元梓就是原发性的破坏力量，则迹近胡说。

在文革后，“做得对的吃不开”的趋势，更得到了极大的强化，所以，聂元梓作为坏人在宣传和定性中间就变得更坏了。但是，这个诱发文革参与强烈批判意识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重了。

聂元梓一生的坎坷曲折，促成了她对官场的朴素批判性，文革期间就此获得标杆地位，由此也带来她后半生的牢狱之灾。“从事于道者，道亦乐得之。”聂元梓早期参加革命，中期对革命后官场产生了朴素的批判性，晚期就此受到官场打压，这些曲折的经历，均与中国革命的原初追求密切相关。一个人也许不是刻意地追求继续革命的，但是，人生际遇如此需要她做出明确选择与抗争的时候，她依据自己的际遇和经验也选择了，然后，她就活成了那个与革命初心无法相互离弃的样子。

如果聂元梓真的预见性地认识到她选择的一切，有能力把控她遭遇到的各种状况，那她就可以与毛泽东那样的革命家相比了，会成为芸芸众生中间的例外，她人生经历和思考的代表性，反而会因此降低不少。

文革虽然被彻底否定了，但是聂元梓看到了的官场黑暗面，以及她付出过极大代价批判过的腐朽状况，都依然存在着，并且更加严重了。在组织及权力普遍化的现代社会中间，聂

元梓的处境和遭遇到的困境，恰好也是我们大多数人日常面临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聂元梓的人生及其曲折，都依然是人类进步阶梯上的一环，她的付出和牺牲依然是有价值的，这肯定会得到后人的公正评价。

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再完美的苍蝇也不过是苍蝇。聂老的一生及其牺牲，都是做战士而付出的代价，她的努力和曲折，都将会给后人以有益的启迪。愿聂老安息！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 来源：《乌有之乡》网站

~~~~~

### 【各抒己见】

聂元梓是一本怎样的书？

• 舒 声 •

聂元梓于2019年8月28日去世，终年98岁。对于她的一生，有各种各样的评论，肯定者有之，否定者有之，惋惜者也有之。8月30日，在《乌有之乡》网站上有署名老田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教科书一般的人生经历：聂元梓的九十八年》，把聂元梓的一生比喻为一本教科书。该文作者对聂元梓显然是充满同情和肯定的，他写道：“聂元梓身上确实存在着继续革命的内在动力，或者潜意识里已经有了想要终结官场腐朽黑暗面的追求，正因为如此，她才坚定地选择向前”，“聂元梓一生的坎坷曲折，促成了她对官场的朴素批判性，文革期间就此获得标杆地位，由此也带来她后半生的牢狱之灾……聂元梓早期参加革命，中期对革命后官场产生了朴素的批判性，晚期就此受到官场打压，这些曲折的经历，均与中国革命的原初追求密切相关”，“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再完美的苍蝇也不过是苍蝇。聂老的一生及其牺牲，都是作为战士而付出的代价，她的努力和曲折，都将会给后人以有益的启迪。愿聂老安息！”

从《乌有之乡》网站上看到老田的照片，相貌其实不老，也就40—50岁，他怎么会产生这样的结论呢？这类未经过文革的中年人对文革并没有切身的体会，却产生了这种肯定文革和文革中代表人物的思想，不能不让人感到，否定文革的思想并未深入人心，彻底否定文革的工作还任重道远。

其实，每个人特别是老年人，都是一本内容丰富的书，这本书都是每个人自己亲笔写出来的。所以老田把聂元梓的一生比喻成一本教科书，并没有错。那么聂元梓究竟是一本怎样的书呢？

作为北京大学文革的亲历者和北大文革历史的探究者，笔者对聂元梓的一生历史也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研究，特提出以下观点与老田及其他研究者共同探讨。

聂元梓的人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参加革命到文革前；第二阶段，文革期间，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她的人生高峰阶段；第三阶段，从文革后到去世。

### 一、阶级斗争理论和极左路线的信奉者和实践者

聂元梓初中毕业后在其兄聂真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先到山西，又回河南，再到山西，再到延安，在中央党校学习了两年，经历了整风和“抢救”运动。抗战胜利后来到东北，先后在齐齐哈尔和哈尔滨工作，成了“年轻的老革命”，12级高干。1959年与第一个丈夫吴宏毅离婚，1960年6月调到北京大学，先后任经济系副主任和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参加革命时间不短，但在她头脑里充满的都是阶级斗争极端化的理论和极左路线的观点，突出地体现在北大社教和文革运动中。

1964年7月2日，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带领调查组进驻北大，先后找了校系部分负责人听取汇报和谈话，除了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以外，都很不满意。7月15日上午，聂元梓第一次到调查组汇报、谈话，时间很长，直到下午1点多，有些意见仍未说完，因而第二天，即7月16日，又主动来张磐石谈。那么聂元梓究竟谈了些什么，从而受到张磐石的青睐呢？据一直参加谈话的调查组成员阮铭说：聂元梓“主要谈到是有关哲学系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也谈到哲学系党内斗争的情况，最后给党委提了些意见，说党委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干部工作方面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sup>①</sup>。张磐石自己也在7月15日的日记中写到：“聂元梓主要还是讲了阶级斗争，而且揭发了些问题”<sup>②</sup>。

7月23日和25日，张磐石又两次找聂元梓谈话，听取她的意见。这两次，聂元梓讲得更为露骨，她讲的主要内容是：

#### （一）北大党委“实际上没有执行中央的指示”

她说：“我们学校离中央很近，实际上没有执行中央的指示，如果说执行的话，也是停留在上面，未深入下去，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学校领导对学校的政治思想状况和阶级斗争是不了解的……和哲学系没有研究过。学校领导对资产阶级争夺青年的情况，教学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情况到底怎样，也是不了解的，你在下面由你自便。这样一个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办法，怎么能贯彻好中央的指示？怎么能把学校办好呢？”她还列举了一些事例，说党委不贯彻中宣部领导同志“在哲学社会学部会议的报告”，不学习贯彻“工业学大庆”精神，贯彻《高教六十条》也是形式主义等。她还暗示：北大不仅不贯彻中央精神，还存在着说假话，制造假经验的问题。<sup>③</sup>

#### （二）北大党委“干部路线上的宗派主义”和干部队伍政治上严重不纯

她说：“我一来就觉得有问题，看了总支委员名单，好像到了另外的世界……现在看来更清楚，在干部政策方面存在着：

1、“有个小圈圈，在校一级领导干部中，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张学书、人事处长伊敏、党委办公室主任魏自强都是陆平从铁道部带来的。另外加上燕大、北大的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干部，都是两门干部，未经过实际斗争的锻炼。对他们破格提拔，是不符合中央精神的，而是气味相投，北大主要是他们来领导”。

2、“陆平同志可能是糊糊涂涂，也可能是清清楚楚地提拔重用了一批政治上不纯的干部”。她根据听来的一些材料，举了10多个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列数了他们成分如何不好，家庭社会关系如何复杂，本人有什么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等等，并说：“他们在下面也弄了一批这样的人，所以说，（北大党委）在使用赶不上看不到原则，起码也是阶级感情问题”<sup>④</sup>

#### （三）北大的问题“要彻底解决，不仅在思想上，还要从组织上变革”

她说：“北大已经出了问题。资产阶级活动猖狂，从政治、思想、学术、教学、教研室工作等各方面看，资产阶级争夺青年够严重了”。“北大已经到了顶头，哲学系的工作到了最后界限，不容许拖了，要不然这个学校就垮了”，“要搞好就要革命”。⑤

张磐石对聂元梓讲的哲学情况和意见，十分欣赏，十分重视。尤其是对他讲的北大中层干部政治上严重不纯的问题，认为是抓住了北大问题的突破口。在听取了其他一些干部的意见后，8月29日，调查组向中宣部报送了《北京大学党员领导干部不纯的一些情况》，即所谓《一号报告》。

《一号报告》中说：“根据初步掌握的材料，北京大学党员干部政治上不纯的问题的确很严重。党委和行政领导的重要部门：宣传部门、组织部门、人事部门、教学部门，以及一部分系的党总支，实际上都是掌握在一批政治上严重不纯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手里。他们有的是本人政治面目不清，历史上有过重大政治问题没有审查清楚的，有的是出身反对剥削阶级家庭，父母被我镇压的，有的是反革命分子和大右派分子的子女。而且这批人，绝大多数是解放前夕和解放初期进入党内，一入党就在学校当领导，没有经过用严格的锻炼和考验的”。⑥

从以上情况来看，聂元梓认为自己是来自根据地的“老革命”，对北大的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充满歧视态度，认为北大干部严重不纯，北大各个部门都充满了阶级斗争，她的阶级斗争观点是多么“敏锐”和强烈，她的看法是多么极端化，这种极左的看法也直接影响了张磐石和调查组，形成了对北大党委和干部队伍的错误估计，对北大当时的工作造成了极大的不良影响，这个影响一直延续到文革，成为文革的前奏和第一张大字报发生在北大的基础。

聂元梓不仅在工作中阶级观念强，处理家庭问题上也具有强烈的阶级斗争观念和极左的思想方法。她第一个丈夫由于犯了错误，运动中受了处分，她就赶紧划清界限，离了婚。1965年秋，她为了找一个政治靠山，又和比她大20多岁的老干部吴溉之结了婚。在吴溉之家与安子文、邓觉先接触的过程中，她发现这两人的关系不正常，就通过关系找到了康生汇报。惯于制造冤假案的康生把邓觉先打成了“英国特务”，抓了起来，使其屈死囹圄。在聂元梓2005年的回忆录中也承认自己是“杯弓蛇影”，阶级斗争观念强的太过分了。而因此，老革命干部（四级）吴溉之也受了牵连，在康生的指示下，聂元梓不得不再次离婚。

## 二、文革中的标志性人物，受益者和受害者的双重身份

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带着社教时的阶级斗争极左观点，在得知彭真已经出了问题时，政治投机，带头写了那张让她出名的大字报，在文革中炙手可热，成了万人瞩目的造反派头头，受到最高领导人的表扬和中央文革江青等人的青睐（亲自在钓鱼台和她谈话），先后当了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与蒯大富等造反派头头同时成为文革的标志性人物。她也因此得意忘形，肆意妄为。她领导的校文革对内迫害干部教师学生，对外到处夺权，直到公然在北大发动武斗，用武力镇压反对她的群众，打死打伤无辜学生，引起最高领导人的震怒，派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北大，夺了她的权。她在文革的舞台上实际只表演了两年多一点的时间，成为昙花一现的人物。1969年后，她先后在江西鲤鱼洲和北大校内劳动，直到1978年被捕，1983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1984年聂元梓从延庆监狱保外就医，1986年被宣布假释。她出狱后居无定所，没有收入，身体有病，曾给胡耀邦、习仲勋等领导人写信请求帮助，后在有关部门帮助下解决了居住和医疗问题，每月

也有了固定收入。可以说她既是文革的受益者又是受害者，也是多数造反派头头遭遇的一个典型。

### 三、死不认罪和不悔改的顽固派

聂元梓被释放后，在2005年出版过《聂元梓回忆录》，2017年出版《我在文革漩涡中》，在这两本书中，她都极力为自己开脱，只承认在文革发动者、领导者的指示下犯了一些错误，对发动文化革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不承认自己有罪，还自我表功。在

《聂元梓回忆录》的自序中，她写到：“在这本回忆录里，我不但要推翻强加于我的不实之词和罪名，冲掉泼在我身上的污泥浊水，也要为那些受我罪名株连的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洗清不白之冤。”她在1985年7月1日给胡耀邦的信里说：“在文革中，我较早地有了觉悟，反了林、江一伙，受到他们的打击迫害。”“我认为这个判处（指1983年3月16日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唯一根据是王力捏造的假证明，诬陷我按江青授意去上海造反参与阴谋夺权，我请求党中央重新处理并恢复我的党籍和工作，宣布无罪，受林、江反革命集团打击迫害，同样应该平反。”⑦在2003年1月3日，她给胡锦涛写的信里说：“这样的判决，我不理解它有什么法律效力，现在，我对判十七年徒刑和相互矛盾的定罪，不提起申诉，因为我坚决地相信党总有一天，在适当的时候，会公正地宣告于世，历史也会自有公论。”⑧在从被释放到去世的30多年中，她一直没有认罪，也没有表示悔改，在接受采访和与她的老部下谈话中始终如此。在临死的前两年即2017年，又出版了第二本回忆录《我在文革漩涡中》，在她的自序“该由谁来承担历史的罪错？”中还在为自己辩解，说文化革命“是被人称为‘五个指头’大拇指即发动者毛泽东的罪错？是林彪、四人帮的罪错？还是我们这些被判刑囚禁了十多年的‘五大领袖’的罪错？以‘何其好也’的那张大字报来说，它恰逢其时地出笼以及所产生的病魔般的效应，绝非简单的‘造反’二字所能涵盖的。这里面既有一个老党员对中央‘五·一六通知’的正常反应，也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在北大历次运动中所造成积怨的症结。”同时还在为自己到上海造反、迫害邓朴方导致残疾等具体问题上推脱责任。⑨像这样至死不悔的顽固派确实很少见，可能也正因为是坚持着这口气，使得满身疾病的聂元梓竟然活到了98岁的高龄。

### 四、聂元梓这本书值得研究

聂元梓一生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从一个初中生到革命干部，到文革时期的造反派领袖，再到犯罪分子和刑满释放人员，她的一生经历复杂，角色多次变换，确实是一本内容丰富的书，读者可以从中看到历史在一个人身上的反射和历次政治运动对一个人的影响，特别是文革这场浩劫对人性的打击和摧残。所以这本书是值得研究的。但它究竟是正面教材还是反面教材？聂元梓究竟是战士还是苍蝇？只有在充分研究之后，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注释：

①见《阮铭同志9月23日在哲学系小组会上的发言》

②张磐石1964年7月15日日记

③胡光伟《聂元梓同志与张磐石同志谈话记录》7月23日

④胡光伟《聂元梓同志与张磐石同志谈话记录》7月23日

⑤胡光伟《聂元梓同志与张磐石同志谈话记录》7月23日

⑥1966年8月9日调查组报送中宣部《北京大学党员领导干部不纯的一些情况》

⑦《聂元梓回忆录》第466页，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⑧《聂元梓回忆录》附录1，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⑨聂元梓著《我在文革漩涡中》第8页，自序，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7年

~~~~~

【痛定思痛】

我出卖了我自己

• 金敬迈 •

我曾是一名部队里的话剧演员，因为排练时伤了腰，不能再演出了，后来尝试写作，到了1962年底，竟成为专业创作员。

我一直想在舞台上塑造一个既平凡又伟大的战士形象，苦于不能为主人公推出一个“高潮”，找不到一个“最强音”，当然也就一直未能如愿。1963年下部队体验生活时，完全出于偶然，听说兄弟部队出了个“大事故”：一个平时很调皮的战士被火车压死了，祸及整个连队，连“四好”也评不上了。那年月，评不评“四好”可是头等大事。出于好奇，也想顺便去南岳衡山散散心，我去了欧阳海生前所在的部队。

短短五六天的采访，无意中为我原来的构思找到了“高潮”，找到了“最强音”：和指导员的矛盾，就是高潮；死，就是他的最强音。

夜以继日，用了28天，我写完了初稿。

忘了是在一个什么场合，我谈了为寻找心目中的英雄而深入部队，并终于在灯火阑珊处找到了欧阳海的体会。一位好心的记者把它登在《宣传动态》上，当时身兼广州军区第一政委的陶铸看见了，大加赞许，说我的体会是《讲话》的胜利——这正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欧阳海本来是一个普通战士，虽说是因公而死，但没有小说《欧阳海之歌》的出现，估计他永远也成不了英雄。当然，我捧红了欧阳海，《欧阳海之歌》也让默默无闻的我，一夜之间也成为名人。

于是，我“红”了起来，开始处处引人注意，用后来的话说，是“一颗新星，冉冉升起”了。

初稿是读给解放军文艺社的鲁易副主编听的。我曾是话剧演员，朗读是我的本行，读自己的作品更是读得有声有色，我自己边读边哭，他也听得泪水涟涟。

鲁易说他当了几十年编辑，从未见过这么成熟的初稿，便提出马上付印。

稿子正要印，问题来了。我的一位老首长，当时是总政文化部的一位领导，大约一眼看穿了我隐藏得极深的“抗上”右的实质，就说：小说的后半部分要改，欧阳海不能反对他的指导员。指导员是“党的化身”，不能有品质上的问题。

两天两夜中，我一气改写了六万多字。这是无可奈何的修改，为了不让指导员有“品质”上的问题，我把一场严肃的思想上的冲突和品德上的差异改成仅仅是一场“误会”。这样，我违背了我，作贱了自己的良知，我改变了整个小说的悲剧结尾。

总政文化部的那位领导看后却很满意，他说，到底是我们党我们部队自己培养出来的作家，听指挥，领会上级的意图快。

1965年7月，《欧阳海之歌》在上海《收获》杂志上发表。10月，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书。

1966年初春的某一天，领导上通知说，陈老总要接见我。其实前几天，我们军区政治部的一位李副主任，已找我去详细交代过，说首长如果发问，你应该如何回答，就像彩排似的先预演过一遍了。

在从化温泉见到了陈老总和张茜、陶铸政委和曾志，还有吴芝圃、王匡等几位负责人。陈老总对这本书夸奖了一番，说：“描写社会主义时代人物的长篇小说中，写得像《欧阳海之歌》这样好的，还是第一部。和平时期部队题材不好写，可以说这是一部带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是我们文学创作史上的一块新的里程碑。”

陶铸也对这本小说给予了充分肯定，又问我目前对这本书有什么反应。我汇报说，总政文化部谢镗忠部长传达了江青的指示：一、不要把欧阳海写成职业乞丐。乞丐不劳而获，是“寄生虫”，和贫雇农民有本质不同。我们不能歌颂流氓无产者。二、欧阳海的哥哥不要被国民党拉去当壮丁。他当了国民党兵，那欧阳海不就成了反动军人的亲属了？我们能歌颂反动军人的家庭吗？三、“最后四秒钟”的描写不好，很不好，一定要改掉。告诉金敬迈，这是非改不可的！

出乎我的预料，陶铸同志笑着望望大家：“最后四秒钟的描写很好嘛，我看很精彩嘛，为什么要改呀？”

陶铸望着陈毅道：“陈老总，你说说。”

“她的事情，沾不得。”陈老总环顾左右而言它，他手拿起一张报纸说，“我就喜欢看你们的《羊城晚报》。”

陶铸停了停之后，非常明确地说：“不要改。不要一听到什么意见就改。文艺作品，哪有十全十美的？今后，关于这本书的修改，你要先通过我。你是我的兵，我说了算！”

很难描述我听了陶铸政委这几句话后的激动心情。我没有料到，正是这件事，埋下了几乎置我于死地的祸根。

《欧阳海之歌》很红，红在它生动地“宣扬了主席的思想”。初稿中只引用了几段“语录”，后来却越加越多。我担心过于突出个人，肉麻，不好，于是又加进了两段《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引文。我原意是稍稍“平衡”一下，“冲淡”一下，绝没有搞什么“两个司令部”的罪恶意图。真的没有。

记得陈老总和陶铸接见时，在座的王匡同志简单地说了几句，意思是书的前半部分比后半部分好，还说，再过些年你就会明白了。

小说的前半部分写欧阳海的童年和成长，后半部分生硬地贴上了很多“语录”。评论文章中几乎是众口一词地对后半部分大加赞扬。王匡同志的几句话，有胆有识，其实我当时就明白了，那年月，就那个气氛，部队按上级的旨意，搞的就是那一套，也符合当时的“生活的真实”。但它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王匡同志不便于明说，我也假装没有听懂。

1967年4月，接到总政通知，要我立即赶到北京，等候首长的召见。

那一天，我被召进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屋里坐满了人，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还有谢富治、叶群等人。

没等我坐下，江青说话了：“金敬迈，怎么，我提的那几条意见，你不改？你真是个大作家呀！这么大的架子？”

这劈头几句，真把我吓傻了。我没有敢申辩，幸亏没申辩。

“我告诉你，”江青接着说，“你那最后四秒钟呀，是《雁南飞》！就是苏修那部《雁南飞》在中国的翻版，你知道吗？我是为了保护你，才故意没给你指明，只说不好，很不好，叫你一定要改掉。我让谢镗忠告诉过你，这是非改不可的！我看你还是个解放军，想保一保你，也才没有对红卫兵小将们讲。只要我说一声，他们早就来揪你的人，烧你的书了！”

《雁南飞》我看过，是苏联一部描写卫国战争的电影。剧中主人公临牺牲前，导演拍了很多空镜头，天在转，树也在转，主人公望着旋转的天空旋转的树，慢慢地慢慢地倒了下去。据当时的批判文章说，这是写了英雄临死前对生命的留恋，是修正主义的大毒草……

还没等我缓过气来，江青又说：“书里那两段‘黑修养’是怎么来的？是你自己写的，还是谁叫你加上去的？你大胆说，不要怕！哼，你不说我也猜得出来，恐怕又是你们那个‘陶政委’的主意吧？今天总理也在，你只管大胆讲，是不是他叫你加上去的？”

我连忙回答：“是我自己写的，是我自己写的。”看见我满脸通红，一脸尴尬，总理拐了个弯说：“总政治部有个报告，最近又有50万册《欧阳海之歌》印好了，但情况有了变化，只能压在仓库里。不删去《修养》中的那两段话，是不能发行的。积压在仓库里，也是对国家财产的浪费嘛。”

“不行。光删去不行！”江青说，“要消毒，要批判！不能放了毒以后，一走了之！告诉你，金敬迈，要不是总理几次提到你，我今天是不会对你这么客气的。小说怎么改，还是听总理的。”她换了个口气，像变成另一个人似的，望着我说，“来来来，今天是总理请你吃饭，我们……”她环顾周围的领导人，“我们作陪。”

1967年4月，北京已满大街是“打倒某某”的大标语。谁也知道这是大有“来头”的。就凭我的那点觉悟，那点水平，就看我当时的处境，就秤秤我那一身软乎乎的轻骨头，我当然遵旨，不仅删去了《修养》中的两段引文，而且进行了批判。对“最后四秒钟”的那点“爱”，也毫不痛惜地割掉了。

我战战兢兢地把修改稿托萧华主任送钓鱼台审查，心里惶惶不安。出乎预料，江青看后说比过去的好，可以先发行，她还要组织人写评论文章。接着《人民日报》就把修改过的《与人为善》全文发表了。

我出卖了我自己。我清清楚楚地知道，我背叛了我的良知。

后来的一切就像我当年演戏一样。不久，我成了首都庆祝“五一”文化活动的负责人；再不久，我又兼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纪念文章的定稿人；再再不

久，我以“解放军负责人”的身份上了天安门城楼；最后，我竟成了“中央文革”文艺组的实际“负责人”。

“负责人”没当几天，江青说：“起用金敬迈本来就出于不得已，现在看来，金敬迈不是我们的人。”果然，没过多久，前后也就是四个月零三天，由谢富治签发的逮捕证，以我“收集中央领导同志黑材料，阴谋反对毛主席”和“趁主席南巡时，阴谋进行绑架”等罪名，将我反铐双手，投入了秦城监狱。

在秦城监狱里，14道铁门层层锁住，单身监禁七年零四个月，2684天，然后释放出狱，送河南许昌某农场改造485天——两项相加，3169天。

三千多天，也算“弹指一挥间”吧！“四人帮”居然倒了。我和江青“交换场地”，她进了秦城一号。

《欧阳海之歌》总共发行了大约两三千万册，《收获》发给我2040元稿费，解放军文艺社不发稿费，只给了点修改费和样书。我除去还了300多元的账以及买了一台收音机外，交了1500元党费。后来发的200元修改费，我也全数上交给党小组了。1967年在北京时，妻子不知从哪儿东挪西凑了600元给我寄去，存在沙滩一个储蓄所里，是给我交伙食费和买烟抽的。谢富治签署逮捕令时，通令全国所有的银行“冻结”金某人的存款，以为我是个“××万元户”，其实，我们全家就那600元，其中还有一部分是些好心的老战友们支援的。3902天之后，我满头白发，拿着“平反通知”，步履蹒跚地从沙滩储蓄所取回739元5角8分。这多出来的139元5角8分，大概就是利息吧。

1978年正式平反后，遵解放军文艺社之嘱，将《欧阳海之歌》又删改一遍后再版。1979年，天津人民广播电台重播《欧阳海之歌》。我随《神州风雷》剧组去北京参加国庆30周年的献礼演出，见到了邓颖超。她对我说：“前不久，听到天津台又在播《欧阳海之歌》，我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这些年来，我们到处打听你，知道你是被他们抓起来了，可我们也没有办法。只可惜呀，总理没能再次见到你。”邓颖超还问我，关了这么多年，身体怎么样，要不要留在北京看看病。我再三感谢她的关心。

1980年的2月底还是3月初，为刘少奇平反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很多人都激动不已，我也处在激动之中。是啊，“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少奇同志临终的这句话，说得多好啊！

想起我的那段劣迹，我真心实意地感到惭愧，羞于见人。

我想到了张志新，她被割破了喉咙管仍然坚持真理。1967年4月11日中央领导召见的那天，我要是不遵照旨意，坚持对《修养》不删不批，顶多也不过是割断喉咙管而已。我枉为一个男子汉。不堪不堪犹回首，这是我的脚印。虽歪歪扭扭，踉踉跄跄，但终究是自己踩出来的。

□ 来源：微信号《读史明智》

~~~~~

【人物追踪】

四川文革“风云人物”沉浮记

• 老 吴 •

▲ 江海云，四川省著名的红卫兵风云人物之一，被誉为“四川省互联网之母”。

江海云（1946—2006）女，江苏省无锡市人，出生在工人家庭。“文革”前考入四川大学数学系，中共党员。

“文革”爆发后，积极投身到“文革”造反运动中。1966年7月的一天，她在四川大学贴出一张大字报，公然反对四川省委所派工作组，川大为之轰动。1966年8月26日，中共四川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在锦江大礼堂召开四川大学师生员工大会，江海云率学生冲上主席团，造了大会的反，从而成为著名的四川大学826战斗团政委，在四川“文革”舞台上曾是名震全川的风云人物。因其个子矮小，身高仅1.43米，被对立派取了个数学味的外号“根号2”。在四川“二月镇反”中，因其领导的川大826战斗团曾到解放军成都军区静坐示威，1967年2月23日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名逮捕入狱。中央解决四川问题会议后，得到平反释放。当年江海云从北京回来后，带回一张与“旗手”江青合影的照片，江海云站在江青身旁。对立派大为不满，说合影时江海云被人拉在了后面，因为个子太矮了急的大哭，江青听见了，说这位小同志是那儿的，站我身边来。

1967年，四川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担任主任。

1968年5月7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任副主任。1969年7月毕业于四川大学数学系。1973年7月17日，任重建的共青团四川省委书记。1974年10月，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文革”结束后受到清查，被撤职、开除中共党籍。后在四川省科技情报所从事技术工作。改革开放后，她转向科技领域，创办了四川省第一个互联网站，其工作成就得到各方好评，主研完成的《国外期刊收藏结构和合理布局研究》《电子信息系统直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和工作模式研究》等四项科研成果分别获得四川省科技进步二、三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996年10月被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中科院、中国科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评为全国科技信息系统先进工作者。历任四川省科技信息研究所研究员、四川省科技顾问团顾问、四川省信息产业专家委员会成员、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四川科技信息研究所数据中心主任，四川英特耐特信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总经理，四川省中药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技术与市场》杂志总编。

2006年1月16日，江海云在四川省人民医院逝世，终年60岁。

▲ 邓兴国（1934—1987）

1966—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成都市公交公司出了一个在全川赫赫有名的造反派头头邓兴国。

邓兴国，四川省绵竹县人，1934年生，高小文化程度，是根红苗正的贫农出身。在成都公共汽车公司参加工作后，任驾驶员。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造就了他的辉煌。他狂热地投入了席卷全国的“造反运动”，组织参加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拉起一支庞大的造反队伍，成为当时的“造反领袖”之一，从而青云直上，曾官至“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总工会副主任、中共成都市人民汽车公司党委书记。

“文革”中，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是名震全川的造反派，与四川大学红卫兵826战斗团一道成为“左”字号造反派的领头羊。1967、1968年，组织、参与攻打成都10中，一、二号桥和成都大学的武斗，造成数十人伤亡。并在省革委刘结挺、张西挺的授意下，组织武斗队参加支援中江的武斗，造成数千人的伤亡。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兴国因继续参与、组织帮派活动，1977年1月，被隔离审查。1978年2月11日，四川省公安厅以反革命罪逮捕，经成都市公安局预审终结，1981年12月1日移送成都市检察院检察起诉，判处有期徒刑18年。1987年10月，邓兴国在狱中因病去世。

曾记否，当年的邓兴国还是很有地位的。1969年7月，他随张国华政委赴西昌解决两大派武斗问题，被西昌造反派奉为钦差大臣。曾经的叱咤风云已是过眼烟云，不堪回首。

▲ 蔡文彬，1942年生，河南许昌人。

1963年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现为电子科技大学）通讯专业学习，任校学生会主席。“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投入到“造反运动”中，成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东方红”造反兵团负责人，后成电“东方红”兵团与成都各大专院校红卫兵联合，组成庞大的红卫兵成都部队，担任红卫兵成都部队负责人。“成都地区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成立后，任负责人之一。1968年5月，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任副主任。后毕业分配到成都锦江电机厂当工人。1973年6月，任共青团四川省委书记。1982年，下派邛崃，任县委副书记，并兼任邛崃农工商常务副总经理，负责桑园乡农工商联合企业的试办工作。后任四川省体改委研究员、国家体改委研究员。

1991年，蔡文彬辞职，创办天一学院。1992年，成立成都天一道盛投资有限公司。1994年，天一学院经国家教委批准，成为我国西部地区唯一一所的具有颁发学历文凭资格的全日制民办普通高校。后公司更名成都天一集团，任董事长。1993年12月，天一集团为解决其属下天一学院教育用房，与工商银行广场支行商定在人民南路修建“天一大厦”。1994年7月开工，开工不久，由于工行广场支行的固定资产投资没有得到总行批准后续资金无法到位，影响“天一大厦”的建设工期。2001年4月，华融成都办老总张桂林以成都天一集团无法履行《财产抵偿协议书》，严重侵害其合法权益为由，向四川省高院提起借款纠纷诉讼，“天一大厦”被查封。从而使天一集团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纠纷诉讼之中。此案历经波折，引起各方强烈反响。省人大、省政协均出面协调，省人大为此专门进行了个案监督。2005年3月，华融成都败诉，张氏因非法处置巨额国有资产被四川省公安厅专案组逮捕。2005年8月18日，在成都沉睡八年的烂尾楼天一大厦正式复工。

▲ 彭家治，四川成都人，1933年生，中共党员，四川石油局32111钻井队副队长。

在“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后不久，1966年6月22日凌晨1时，四川南部合江县天然气井塘河1井，在进行投产前的关井测压时，突然发生井喷事故，井场顿时变成一片火海。在这里钻井的32111钻井队职工迅速投入了制服井喷、扑灭火海的战斗，用鲜血和生命保住了这口大气井。全队6人牺牲，21人负伤。中共石油工业部党委授予32111钻井队“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主义钻井队”称号，追授该队已牺牲的张永庆等六人及授予在“血战火海”中表现突出的张仲珉、雷洪炳、王存友、王有发、胡德炳、冉树荣、彭家治等七人“石油工业部五好标兵”称号。几个月之后，32111钻井队这个中国工人阶级的英

雄集体，就分裂成以彭家治为首的四川石油革命造反司令部，以王存友为首的32111队“革命造反团”势不两立的两派，陷入“全面内战”之中。

“二月镇反”中，四川石油革命造反司令部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勒令解散，一些成员遭到逮捕。1967年4月初，由周恩来主持在北京召开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上告状的彭家治获准参加了会议。此后彭家治青云直上，1968年5月担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68年10月，担任四川省石油管理局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打到“四人帮”后，因“文革”中，参与指挥“武装支泸”等大规模武斗，大搞帮派活动受到清查。1979年12月，彭家治被撤销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职务，被判有期徒刑10年。

### ▲ “武斗之花”宋立本的凋落

1968年3月，“成都工人造反兵团街道分团”的团长，号称“武斗之花”的宋立本被对立派“红卫兵成都部队”抓住，在酷刑之下被折磨致死。画家苟乐加曾亲眼见过宋立本的尸体，为此创作了油画《宋立本》，再现了“文革武斗”中的恐怖和暴力。

宋立本是成都市一个街道企业的职工，据说他曾经因为乱搞男女关系，被抓去劳教过。“文化大革命”中，他狂热地投入到造反运动之中，参加了“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并成为号称有数万人的街道工业分团的团长。相传，对于劳教，他一直对公安局怀着不满，以至于“文革”中大打出手，要“砸烂公安局、抓出‘黑公安’”。1967年1月29日，他率领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街道工业分团为主的数千余人，冲进成都市公安局，砸抄办公室和保管室，抢走文件、档案材料以及手铐、枪支子弹等，并绑架走干警21人。1月30日凌晨，成都军区派出部队，在公安干警的配合下，对设在古中市街“少年之家”内的“街道工业分团”团部驻地实施戒严，逮捕了“1·29”事件为首抢劫公安局的宋立本、黄全章等7人，查获被抢走的所有文件档案资料和各种物资，救出被劫持的干警。4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转发《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李文清在市中心体育场召开群众大会，向革命造反派公开道歉，表态支持革命造反派，才得以被释放出狱。

1968年初，成都武斗升级，为了抢占有利地位，两大派群众组织“八二六”派和“红成”派在市中心人民南路各自抢占楼房作为据点，调集武斗人员开展大规模武斗，展开你死我活的争夺。宋立本在武斗中，更是一个狠角色，敢打敢拼，以亡命著称。成都10中，位于陕西街与人民南路交界，面对四川省高教局，右侧为成都市第一门诊部，处于成都市中心位置。它是“红卫兵成都部队”在市中心唯一的据点，四周孤立无援，就像插在“兵团”、“八二六”派心脏的一个钉子，从而成为“兵团”、“八二六”派首要的攻击目标。为了尽快攻下成都10中，从2月17日开始，“兵团”委派宋立本亲自指挥率领人马，向成都10中“红成”发起攻击。

在攻击10中的战斗中，宋立本亲自抱着炸药包不要命地往前冲，一声惊天动地爆炸声！把高教局的大楼炸开一个大洞，从而占据了高教局大楼，让“10中红成”完全暴露在“兵团”的火力面前。在孤立无援中，为避免腹背受敌，“红成”撤离了10中。此次武斗历时近一月，共打死40人，伤102人，并放火烧毁了成都市第一门诊部大楼。

此次战斗宋立本的英勇壮举令人们刮目相看，从而名声大振，却令“红成”派十分沮丧，发誓要诛杀宋立本，为死难“烈士”报仇雪恨。

其后据说，宋立本被隶属于“红成”的中学生组织“红卫兵成都野战军”（俗称“野鸭子”）绑架，被折磨致死。

宋立本之死还有多种传说：一说“10中”事件后不久，宋立本有一次带几个随从保镖到成都第三人民医院看病，被埋伏在大门外两端的武装学生挟持上北京吉普。上车后，一直开到地质学院红成分部，当晚即轮番审讯拷打，被仇恨染红了双眼的红成学生，用尽各种令人发指的方法逼供，用刺刀挑断其脚跟脚筋，宋昏死过去之后，又刮其肚腹，挖去双眼珠，最后，在头颅顶上穿一个窟窿，用竹筒插入，用棉花搓成芯“点了天灯”。

一说：在螺马市街上，宋立本在警卫人员的护卫下，坐一辆军用吉普车上西门办事，此时迎面开来一辆小车挡住去路，对方车上下来一位身着军服的红卫兵小将，对着宋立本敬了个军礼！说：“宋司令，二号桥战事吃紧，第三分团请你过去指挥作战！请司令上车，我们送你过去。”宋立本没有防备之心，下车坐到对方车上。这一去宋立本走上了无归路，据说叫他上车的是假装三兵团的红成战士，汽车直奔南门四川医学院而去。在川医，宋立本受到残酷的折磨。死后被丢在了福尔马林药水里。

有的说，宋立本是被成都1中红成“一月风暴”抓住的，有的说是在无线电机学校被折磨死的。有的说，被“红成”抓住后，是中学女红卫兵练刺刀，挖膝盖，点天灯致死的。

不管怎样宋立本的死是残酷的，也让同派之人着实伤心，据说兵团总头目邓兴国也暗自伤感落泪，并在民革四川省委为宋立本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仪式。

▲ 熊代富，重庆人，1945年出生，家庭成分工人。重庆大学冶金系炼钢专业69级学生，共青团员，曾担任班团支部委员。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他积极投入到造反运动中，成立“铁扫把”战斗小组，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工作组，而受到人们的注目。重大815战斗团成立后，任政委。在“文革”初期，是重庆造反派中著名的代表人物。1967年，“一月风暴”夺权后，任重庆市革联会副主任。

1967年6月5日，他率815战斗团到北碚支援西南师范学院“春雷”战斗团，与西师反到底派“831”战斗团发生武斗，将“831”驱赶出学校。他率人返回途中，在北碚施家梁一带被反到底派围攻，被俘至残。从此淡出派性斗争和武斗。

1967年12月，重庆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任革委会副主任。1968年6月，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任副主任。1973年6月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并担任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1973年7月，当选共青团四川省副书记。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清理三种人罪行中，1979年3月被撤消一切职务。后分配到重庆微电机厂工作。1989年后，先后到深圳、珠海，历任艾德维（香港）合资公司、美国协和集团总经理。1994年辞职回到重庆，利用在协和集团任总经理时建立起来的关系，打通销售渠道，开始经销数字寻呼机。1996年，他开始向饮用水行业转型，作为深圳安吉尔公司的代理，成立重庆安吉尔科技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到1997年，他把持了重庆的饮水机市场大半江山。每年销售的桶装水上百万桶，年销售额数千万元，成为行业内三大巨头之一，历任重庆市饮用水协会副会长。

▲ 邓长春，四川宜宾人，1945年出生。国营重庆望江机器制造厂工人，共青团员。

1966年“文革大革命”运动中，参加造反。1967年5月，任军工井冈山总部勤务组副组长，6月任重庆工人革命到底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因反对革联会，被称为反到底派，与815派对立）勤务组常委。1967年7月底，两派大规模武斗爆发后，邓长春成为反到底派的武斗总指挥，在重庆市第四女子中学建立“黄山警备司令部”，自任“司令”，指挥武斗。亲自参与并指挥“军工井冈山第一舰队”进行“八八海战”。此战，双方死亡24人，打伤129人，打沉人民28等船只3艘，打坏12艘，致使长江封航40天。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武斗队头头李鲁沂在支援电力学校时被击毙。8月18日，在舰艇一号船上邓长春为李鲁沂举行追悼会，下令枪毙两个815派俘虏，为其祭灵。8月22日，又组织攻打上新街大庆民中，并参与、指挥了其它大型武斗。1968年5月，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任常委。1968年11月7日，在北京召开的国防企业工厂和协作工厂抓革命促生产会议（自8月15日起召开，简称“815会议”）上，与会代表揭发军工系统两大派负责人邓长春、方文正二人指挥武斗、枪杀俘虏，以“武斗杀人”、“破坏大联合”等罪名被逮捕关押。11月9日，重庆市革委会、警备区召开“全面落实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动员清理阶级队伍大会”，重庆驻军负责人宣布：邓长春、方文正二人在北京“815会议”上已“按照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逮捕”，并公布邓、方二人的罪行材料。

“文革大革命”运动结束后，1978年4月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刑满（减刑两年）出狱后在私营企业工作。

2003年春节，邓长春在重庆逝世，终年58岁。

▲ 游寿星，重庆人，1940年生，出身工人家庭。四川大学学生，中共党员。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投入到造反运动之中，参与组织成立四川大学东方红826战斗团，任团长，成为红极一时的风云人物。1967年“二月镇反”中，826战斗团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受到镇压，他逃亡北京，躲过一劫。1967年5月19日，他率“826”、“工人造反兵团”及“首都红代会驻蓉联络站”人员共2000余人，携带铁棍、大刀、梭标等，以宣传“红十条”为名，前往被称为保守派组织的根据地成都郊区琉璃场和双流县中和场，遭到“产业军”、“贫下中农战斗军”的围攻，他与数百人被捕捉为俘虏，先后关押在双流县中兴场、仁寿县、眉山县等地“劳动改造”。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都军区的干预，6月7日，获释。

1967年，四川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任副主任。1968年5月，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任常委。1975年，当选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后受到清查，撤销一切职务，在四川大学物理系任教。曾参与编著《基础理论物理》。

□ 摘自微信号《故园怀旧》

~~~~~

【乱世人生】

戈华冥诞百年祭（下）

• 樊能廷 •

（上接 z k 1 9 1 2 a）

四、文革校刊《新北大》对戈华的“文攻”诬陷谩骂

1967年10月7日，《新北大》第五版社论《打倒戈华》：“铁的事实证明，戈华是个地地道道的党内走资派，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铁的事实还证明，旧北大确实是池深王八多，一小撮走资派及一小撮阶级敌人总是不甘心他们的失败，总是在那里作拼死的挣扎。”

同一版面，《揪斗戈华好得很》。第五、六、七、八版，《彻底清算三反分子戈华的反革命罪行（之一）》。1967年10月15日，《新北大》第三版，《彻底清算三反分子戈华的反革命罪行（之二）》。

1967年10月12日，《新北大》第124期，第二版，刊登“战地火花”《批斗三反分子戈华》：本月九日，新北大公社召开“批斗三反分子戈华大会”。新北大公社战士和全校革命师生员工一致愤怒声讨戈华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

第四版《彻底粉碎北大老保翻天的逆流》说：“陆平黑帮的第二把手戈华是个不折不扣的三反分子。”

10月15日，《新北大》第125期，第三版转第四版，刊登新北大公社“持久战”兵团第二战斗队、红色警卫团“照妖镜”战斗队《彻底清算三反分子戈华的反革命罪行——三反分子戈华罪恶事实之二》。

12月2日《新北大》139期第三版，短评《一个极其重要的措施》说：牛辉林之流把广大革命干部视若仇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依靠三反分子戈华、反共老手周一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周培源之流；他们纵容老保翻天，为复辟旧北大张目，他们的政治纲领决定了他们必然反对革命的领导干部。

12月9日《新北大》第三版《活捉戈华，气死牛辉林们》有枝有叶、绘声绘色：“潜逃在外三个月之久的三反分子戈华，于12月3日被我英勇的新北大公社战士生擒了。早在九月初，我公社战士查抄了三反分子戈华的老巢，戈华在沙河躲了一个月零两天。10月8日，在牛辉林之流策划下，派人护送戈华逃往山西，后因见势不妙，又潜回山东老家邹平县明集镇郭吕村。我新北大公社战士把对三反分子戈华的阶级仇恨化为力量，于10月11日开始追踪搜捕戈华的战斗。在红二组的协助下，分兵几路，控制了戈华可能藏身的几个点。10月20日，我公社战士前往郭吕村围捕逃犯戈华。牛辉林之流派人与10月18日上午11点赶到山东，不到一小时，戈华如丧家之犬，再次潜逃。我公社战士跟踪追击，布下天罗地网。戈华12月2日潜来南口，他做梦也没想到，此行竟是自投罗网，我新北大公社战士于3日晚终于把这个惊魂未定的三反分子戈华活捉了”。

注意：今天人们不禁要问，当年“钢一连”的好汉们，至今有一个人胆敢站出来承认自己依仗聂孙权势抓人、打人、武斗、抄家乃至杀人的恶行么？一个也没有！有一个人胆敢站出来承认自己抓捕戈华么？没有！一个也没有！这就是聂孙卵翼下最“铁杆”的“钢一连”！

同期第四版，刊登本刊评论员《走自己的路，让牛辉林之流去哭泣吧》：……为什么他们公然对抗中央文革，对抗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为保守组织“井、红”翻案？为资产阶级

反动路线在北大的代表人物孔、杨翻案？为什么他们死保陆平、彭珮云。对走资派戈华，反共老手周一良、侯仁之、季羨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周培源等人亲如手足，奉若神明，言听计从？

12月14日，《新北大》第142期第四版，刊登新北大公社“持久战兵团”第二战斗队《戳穿北大井冈山黑高参戈华反革命两面派的咀脸》，四千余字说：“我们现在就剥开戈华的画皮，看看这个被井冈山牛辉林之流吹捧为‘经过长期阶级斗争的革命领导干部’是什么鬼玩意。”

12月16日，《新北大》刊登本刊记者《斗臭戈华》：新北大公社战士和全校革命师生员工于12月13日晚在再次斗了北大老保翻天的急先锋、北大井冈山黑高参、三反分子戈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平、彭珮云，反共老手、反动学术“权威”、北大老保翻天的黑干将周一良、侯仁之、季羨林也被揪上了斗鬼台，今天在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面前丧魂落魄，威风扫地，真是大快人心！

12月20日《新北大》144期，第四版，新北大公社新北大人、红色清道夫、红梅、起风雷、扫雷、岿然不动、顶风船、文二（四）一支队、0763支队、钟山风雨、07东方红、第二刺刀见红《北大井冈山是极右势力和极“左”思潮的混合物》说：北大井冈山兵团是北大极右势力和极“左”思潮相结合的怪胎，这个怪胎是关、王、林反党集团的蕴育下堕地的。这个兵团的决策人戈华、周培源、孔繁、杨克明、牛辉林、俞启义之流代表了北大的极右势力（有些本身就是极右分子）。而以0363北京公社为代表的原团、O派广大战士则是北大的一支受极左思潮影响较深的，造反队伍内部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派别。但是，他们早已被绑在周培源、牛辉林之流的战车上，成为极右势力在北大复辟资本主义的打手和工具了。这就决定了井冈山兵团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必然对外投靠关、王、林反党集团，对内打击革命左派，纵容老保翻天，必然充当了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在北大复辟资本主义的保皇角色。

1968年5月9日，《新北大》174期，第一版，新北大公社总部《关于砸烂操纵保守组织北大井冈山兵团的一贯反抗中央、反抗中央文革的反动小集团的第一号公告》说：

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揪出了操纵保守组织北大井冈山兵团的一贯反抗中央、反抗中央文革的反动小集团，打倒了这个反动小集团核心人物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戈华、牛辉林、樊立勤。这是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又一重大胜利，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新北大的又一重大胜利。

包括戈华、牛辉林、樊立勤在内的、操纵保守组织北大井冈山兵团的反动小集团，推行了一整套结党营私、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他们集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五个回合中跳出来的反动分子，网罗北大深池中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反共老手等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乌龟王八，组成了自己的骨干队伍；他们蒙蔽了一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拉起了保守组织北大井冈山兵团，疯狂地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包括戈华、牛辉林、樊立勤在内的、操纵保守组织北大井冈山兵团的反动小集团，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设在北大的桥头堡，是王关戚杨余傅反党集团及其黑后台安插在北大的别动队，是北大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的还乡团，是北大陆平王朝的复仇军。罪恶累累，罄竹难书。

新北大公社总部号召新北大公社全体战士，发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英雄气概，以实际行动实现我们“站在第一线，保卫毛主席”的钢铁誓言，乘胜前进，奋勇追击，将现行反革命分子戈华斗倒斗臭！将现行反革命分子牛辉林、樊立勤捉拿归案！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操纵保守组织北大井冈山兵团的反动小集团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同期第一版，《关于公布北大井冈山兵团中的反动小集团第一批材料的按语》说：

今天，本刊公布井冈山兵团中的反动小集团的中坚分子牛辉林、戈华、樊立勤的一批综合材料，这仅仅是他们进行一系列反革命活动的一个缩影。

牛辉林是江青同志去年九月一日点名的“红旗飘”中的坏人；樊立勤是恶毒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分子、“东方红”的代表人物；戈华是个具有反革命经验的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井冈山兵团的黑高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上窜下跳，四处点火，活跃异常，闹得很凶，表演得很充分。有些好心人曾误认为他们是什么“革命闯将”、“革命干部”，其实，他们是一小撮地地道道恶蛇恶狗，是疯狂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小丑。由这一小撮人为骨干组成井冈山兵团中的反动小集团，是十足的国民党反动势力，他们的基本队伍是由间谍、特务、叛徒、右派、反共老手、反动权威以及社会渣滓等乌龟王八所构成。

在刘邓黑司令部及其小爪牙指挥下，以牛辉林为首的“红旗飘”的坏人、樊立勤为首的“东方红”的坏人和以戈华为代表的走资派、特务、叛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相互勾结的统治下，井冈山兵团疯狂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大反特反中国人民解放军，纵容老保翻天，顽固坚持“打倒聂元梓、砸烂校文革”的资产阶级反动政治纲领，顽固地对抗和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三月二十五日以来，在牛辉林的直接组织和指挥下，勾结校外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在北大多次挑起大规模武斗流血事件，并指使反革命暴徒刺杀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聂元梓同志，打伤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同志，制造了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四点指示”下达后，牛辉林等疯狂对抗，拒绝执行，并进行了一系列反抗中央的活动。他们至今拒不交出凶手，反而变本加利，不断地挑起武斗，制造谣言，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继续破坏文化大革命。

牛辉林是一个罪行累累的现行反革命，必须立即捉拿归案。

同期第二版，刊登《北大井冈山反动小集团坏头头现行反革命分子牛辉林的罪行》。

注意：此文把学生牛辉林打成“反动小集团坏头头”、把学生樊立勤打成“反动小集团重要骨干”，把老干部戈华打成“反动小集团黑高参”。扣在“井冈山兵团”头上的帽子是“反抗中央、反抗中央文革、反对文化大革命”。

同期第三版，刊登《北大井冈山反革命小集团的黑高参、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分子戈华的罪行》，四千余字：

（戈华）一九六三年调任陆平黑帮党委第一副书记兼副校长，是安子文反党集团安插在文教战线的一颗黑钉子。”“去年九月一日以后，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江青同志‘九·一’讲话的号召下，奋起反击老保翻天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戈华不仅不向人民低头认罪，反而在井冈山兵团中反动小集团的保护下，潜逃外地，长达三个月之久，逃避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批判斗争，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戈华是北大老保翻天的黑主帅和急先锋，是“七·一〇”砸保卫处反革命事件的指挥者之一。他亲临反革命事件的指挥部——前井冈山兵团第一把手周培源家里，与周培源及井冈山兵团少数坏头头一起出谋划策，坐镇指挥，犯下了严重罪行。

注意：这一段谎言编得太穿帮——所谓“七·一〇砸保卫处”，远在“八·一七”井冈山兵团成立之前。竟然有戈华凑到周培源家里与（并不存在的“井冈山兵团”）头头一起出谋划策的情节，这个情节竟然又被《新北大》所掌握。尽人皆知聂元梓擅长撒谎，撒谎不带打草稿的，她把控的报纸《新北大》也是同样撒谎不打草稿。

5月23日《新北大》178期第一版，新北大公社总部《关于砸烂操纵保守组织北大井冈山兵团的一贯反抗中央、反抗中央文革的反动小集团的第二号公告》说：

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揪出了操纵保守组织北大井冈山兵团的一贯反抗中央、反抗中央文革的反动小集团之后，在打倒了这个反动小集团的第一批核心成员、现行反革命分子戈华、牛辉林、樊立勤之后，乘胜前进、奋勇追击，今天，又揪出了井冈山兵团反动小集团的第二批核心成员张侠、张景元、俞启义。

由于反革命的共同需要，张侠、张景元、俞启义和戈华、牛辉林、樊立勤等人结成死党，上下串连，八方搭桥，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成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马前卒，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对他们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北京大学历来就是两个阶级，两个司令部争夺的重要阵地。由戈华、牛辉林、樊立勤、张侠、张景元、俞启义及其他一些反革命分子组成的井冈山兵团反动小集团，在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授意下，提出了一整套反对、破坏、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动政治纲领。

为了更有效地对井冈山兵团反动小集团及其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新北大公社总部号召：新北大公社全体战士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这一伟大教导，团结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尤其是井冈山兵团中广大革命和要革命的同志，发挥出每一个革命同志的主观能动性，将戈华、张侠斗倒斗臭，将现行反革命分子牛辉林、樊立勤、张景元、俞启义捉拿归案，继续奋勇前进，在夺取新北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战斗中立新功！

打倒张侠！打倒张景元！打倒俞启义！

打倒戈华！打倒牛辉林！打倒樊立勤！

彻底砸烂操纵保守组织北大井冈山兵团的一贯反抗中央、反抗中央文革的反动小集团！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注意：人做天看，《新北大》说的不算数——它声嘶力竭嚎叫打倒的六个“反革命分子”，一个也没打倒。最终，聂元梓和孙蓬一被法庭审判为“反革命罪”，被打倒，关进“无产阶级专政”大牢服刑去了。

同日同期第三版，文科抗大班《北大老保井冈山的十黑》：

一个黑班底——北大井冈山兵团的反动小集团

北大井冈山中有一个反对中央文革的反动小集团。这个反动小集团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北大的代表，它是由下列几种反动势力所组成：（1）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如戈华、李建武、文重、肖永清之流；（2）反共老手、反动权威、洋奴，如季羨林、周一良、侯仁之之流；（3）国民党残余、特务等，如陈仲夫、赵占元之流；（4）反抗中央、反抗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小丑，如牛辉林、樊立勤、谢世扬之流；（5）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北大的代表人物，如孔繁、杨克明之流。

6月1日，《新北大》第180期第二版，本刊讯《我校将隆重集会，庆祝毛主席批发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二周年，热烈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五月二十五日，在划时代的文献《五一六通知》的鼓舞下，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发扬“五·二五”革命造反精神，愤怒斗争了吴子牧、宋硕、陆平、彭珮云、戈华、张侠、王庆淑、陈守一等反革命黑帮。

6月7日《新北大》182期第二版，新北大第二期两派革命群众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原井冈山兵团全体学员《给井冈山中革命同志的一封公开信》说：严峻的阶级斗争的事实告诉

我们，左派犯错误，右派利用。王关戚反党集团及其在北大的代理人牛辉林、戈华之流，正是利用校文革和聂元梓同志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先拉队伍，然后无限上纲，肆意歪曲中央首长的讲话，从而达到他们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目的。

1968年6月14日，《新北大》第184、185期合刊第一版，社论《誓将“三反一粉碎”斗争进行到底》：…“出于反动的阶级本性和共同的利害关系，使这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井冈山兵团反动小集团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勾结起来，用同一个腔调咒骂新北大年轻的红色政权校文革“执行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资产阶级专政，镇压群众”。对于阶级敌人的坚决、彻底、全部、干净的镇压，就是对广大人民群众最大的保护。陆平、戈华之流和井冈山兵团反动小集团，是刘邓陶、彭罗陆杨的黑爪牙，是谭震林、杨余傅、王关戚的乏走狗，他们是资产阶级黑司令部镇压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凶恶打手！对他们的镇压，好得很，这正是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坚决粉碎右倾翻案妖风，把陆平、戈华之流揭深批透、斗倒斗臭；把井冈山兵团反动小集团彻底摧垮、彻底砸烂。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战斗任务，这就是我们学习门合同志，‘一切紧跟毛主席’的实际行动。”

同期第四版，激扬《祖传败方的新花样》说：戈华不是三反分子、特务、现行反革命吗？张侠不是走资派、假党员吗？俞启义、牛辉林等人不是疯狂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小丑吗？

同期第五版，本刊记者《揪斗戈华好得很！》。

同期第五版至第八版，刊登新北大公社“七一”战斗队等十一个单位《彻底清算三反分子戈华的反革命罪行——三反分子戈华的罪恶事实之一》，约一万五千字。

7月26日，《新北大》第196期，第一版，刊登本刊编辑部《北京大学的革命火焰》：……北京大学的革命火焰，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点燃的。当刘邓黑司令部要把它扑灭时，又是毛主席派中央文革和江青同志把它重新点燃起来！两年来，以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不断地刮起阵阵阴风，从邓小平、陶铸、王任重到谭震林、王关戚、杨余傅都曾经伸进黑手，妄图把毛主席亲自点燃的北京大学的革命火焰扑灭。但是，革命的火焰是扑不灭的！它带着不可战胜的强大生命力，在阵阵阴风中，更加旺盛地燃烧起来了！在北京大学内部，从陆平、彭珏云倒台之后，刘邓黑司令部扶植了一批又一批他们的代理人，什么孔繁、杨克明，什么徐运朴、侯汉清，什么白晨曦、戴新民，以及最近破获的以牛辉林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集团，他们都陆续同毛主席支持的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了较量。但是，同他们的黑组织一样，他们都被革命的火焰烧得焦头烂额，死无葬身之地！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特别是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一直以极大的关心，注视着北京大学的斗争。在每一个关键时刻，江青同志都挺身而出，一次次地把革命的火焰烧得更加旺盛！当孔繁、杨克明在王任重指使下，在北京大学的政治舞台上表演了一番之后，江青同志指出：“你们学校刘邓路线体现在孔繁、杨克明身上。”当牛辉林、徐运朴、侯汉清拉起队伍，与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分庭抗礼的时候，江青同志一针见血的指出：“红旗飘里准有坏人”。当戈华、张侠等乌龟王八，伙同井冈山兵团现行反革命集团向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反攻倒算时，江青同志果断地指出：“北大是老保翻天。”当王关戚反党集团疯狂围攻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时候，江青同志支持我们说：新北大公社是一个很好的革命组织。当杨余傅反党集团再次玩弄真黑手抓假黑手，转移视线，掩护自己过关的丑剧，把矛头指向聂元梓同志的时候，江青同志又明确指出：聂元梓同志有缺点错误，要批评她，但是要保她！当井冈山兵团现行反革命集团在黑后台支持下举起屠刀，砍向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时候，江青同志指示：抓凶手和后台绝不能手软！新

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每一个胜利，都凝结着江青同志的心血，都是由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

注意：“新北大公社是一个很好的革命组织”这句话至今来路不明，这句话也是自恃“上面有人”的掌权派聂元梓“浮夸狂躁”的病根之一。岂不知“禄无常数，福无定门”？

注意：江青是“新北大公社”的“保育员”，对于“新北大公社”有阿保功劳，但“新北大公社是一个很好的革命组织”这句话至今来路不明。

注意：从这一段文字看，聂元梓“校文革—新北大公社”以派划线、认定戈华为反聂的元恶大憨，而他们“校文革—新北大公社”跟他们的“园丁”江青之间，实在“水乳交融、蜜里调油”啊。

8月17日，军宣队进校前两天，《新北大》第二版社论《新北大两派群众组织联合起来》对于戈华仍是不依不饶：“新北大两派群众组织应立即停止一切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刘邓陶、王关戚、杨余傅、陆平、彭珮云、戈华及一切反革命分子、叛徒、特务。稳、准、狠地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动猛烈的进攻。”

五、井冈山兵团保戈华有心无力

1967年12月3日，聂元梓“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在京郊昌平区南口非法抓捕了戈华。

戈华作为“三结合”对象，井冈山兵团不得不加快了“戈华专案”的审查进度。1968年2月，“井冈山兵团干部组戈华问题专案组”终结了对于戈华的专案审查，做出了审查结论，见本文附录一。

3月4日《井冈山》第49期，《校内通讯》：

兵团总部及我兵团102个战斗队发表声明强烈要求释放戈华。

为了贯彻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捍卫《六六通令》，兵团总部及我兵团平型关纵队、中南海纵队、天安门纵队、延安火炬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等102个战斗队，于2月26日分别发表声明，强烈要求校文革立即无条件释放原北大党委第一副书记、副校长戈华，并同意派遣戈华参加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声明指出：经过调查，认为戈华不是叛徒，不是特务，不是自首变节分子，不是走资派，他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经过对戈华全部历史、全部工作的考察，认为他几十年来历史清楚，为党做了一些工作。在北大社教中表现是好的，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和彭真、陆平黑帮做过斗争，文化革命初期支持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当然，在三十年工作中，特别是在河北大学后期工作中，他犯有严重错误。

声明认为，经过真正的三划一站，戈华是可以站出来革命的。

声明指出，校文革将戈华蛮横无理扣押达三个月之久，不让他接受广大革命群众的审查和批判，是违反《六六通令》的，是极端错误的。

井冈山兵团无力救助戈华，只好求助于驻校解放军部队。无奈驻军（63军）囿于派性立场，对于戈华事件不闻不问，对于聂元梓校文革——“新北大公社”的所作所为，听之任之，也跟着聂元梓犯下了历史错误。

六、文革后期及文革后的戈华

1972年12月29日，校党委常委、革委会常委会议决定：前党委第一副书记戈华，交全校代表会批判、帮助后，给予解放。这是最早在校内“解放”的最高职位的干部。

1975年4月4日，校党委常委会开会，讨论部分干部的安排使用问题，决定陆平到校教改组、彭珮云到政工组、戈华到党委办公室工作。

1978年1月17日，校党委常委会开会，通报聂元梓要求周林转给邓副主席、华主席的信。聂在信中不承认自己有反周总理的罪行，也不承认与康生、“四人帮”有联系。会议决定：加强聂元梓的专案工作，由戈华挂帅，张学书具体负责，抓住主要问题进行清查。

戈华挂帅加强聂元梓的专案工作，戈华怎样对待聂元梓——“新北大公社”红卫兵跟踪追缉三个月，1967年12月3日，随踵而至，从昌平南口把戈华副校长抓回北大。戈华落入聂元梓手中，批斗数十场，打掉两颗牙齿、打断两根肋骨。现在聂元梓落入戈华为首的专案组手中，戈华可是连她一手指也没碰，表现了戈华的政策水平和高风亮节。

聂元梓怎样对待戈华，而戈华又是怎样对待聂元梓，两相对照，这就是人性的较量，就可以看出人性与兽性的区别。

◇ 结语

在北大，戈华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领导干部，历史上为中共的高校教育作过一定贡献。他又是身居领导岗位，有一定独立思想，敢于直言秉道，屡有直言抗上表现，作风正派、为人正直。文革中，仅仅因为对于聂元梓不满，站在井冈山兵团一边（组织上加入了井冈山），受到聂孙恶势力的残酷迫害。文革后，他又不顾年老体衰，满怀热情投入他所热爱的教育工作，积极出谋划策，为改进林业部门的教育事业，贡献全部力量。

戈华在三年困难时期，关注民生，他敢于说：在社会上有天灾人祸，在学校里也有天灾人祸”，“市场上不走后门，买不到东西……”，“农村生产力破坏严重，牲口现在不是病，就是死（听一个县的书记讲，大兴县的牲口死了一半），不讲等价交换，按劳分配，党群关系破坏了，在这个意义上讲，党的威信降低了。苏联讲物质刺激当然不对，我们不讲物质利益也太过分了，农村生产不好，有天灾也有人为因素，只讲天灾农民不信服。盲目乱干的倒成了先进了，老老实实干的倒成了后进了（我有些感性知识，有些地方浮夸亩产××万斤，被誉为先进，河北某边远山区无人过问，人家社员干部埋头干，生产扎扎实实逐年上升了）。《人民日报》宣传唯心主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徐水三年实现共产主义”），农村中农民是有意意见不敢说。于是我说：“专政专得要死，人民有话不敢讲。……

这些，表现了戈华的实事求是精神，民生民本思想，人道的情怀。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戈华写得一手好字，书法有点儿造诣，在北京海淀区百望山森林公园碑廊，有各级领导人和名人题写的碑文，其中也有戈华书写的一通石碑（见插图）。

可以说戈华不失为毕生从事教育、为国作育人才的好领导，永葆爱国爱民情怀，不失本色的书生。

无负平生，戈华和平去处安息！

谨以此文，纪念戈华诞辰一百周年。

◇ 附录一、戈华同志专案

首都红代会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干部组戈华问题专案组
一九六八年二月

▲ 戈华情况介绍

概述

- 一、戈华履历表
 - 二、戈华三七年参加革命——中组部工作期间的情况
 - 三、戈华在河北大学的情况
 - 四、戈华在北京大学的情况
 - 五、戈华在文化革命中的情况
- 专案附录

▲ 戈华同志简况

戈华同志是北京大学原党委第一副书记兼副校长。

戈华，中农出身，学生成份，现年四十九岁，山东邹平县人。三七年参加革命，三八年入党，以后一直在晋察冀边区担任党的工作，解放后曾先后在中央组织部、天津河北大学工作，六三年三月调至北大。

据调查，戈华同志历史清楚，没有投敌、叛变行为，不是黑线上的人。大量事实证明：三十年来，他为党为人民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虽然他在某个时期、某些工作中犯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甚至有些是政治立场的错误，有些是三反性质的言论。但根据毛主席的教导，考察他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我们认为，戈华同志不是走资派。

戈华同志三七年在山东邹平简易师范读书，参加了进步师生组成的《读书会》及我地下党领导的《民先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他没有参加任何反动党团及其外围组织。三七年十一月在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后留校任支书等工作。以后一直在晋察冀边区担任党的工作。据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反映：戈华工作热情、有朝气、群众关系好，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对敌斗争勇敢。四九年南下后，戈华大多搞党校工作，这期间戈华工作踏实，艰苦负责，深入群众，为党培养了一批干部。

五二年中央为了加强各部，抽调一批干部，戈华调到中央组织部工作。起初任干事。五四年至五七年任干训处第二副处长。戈华主要负责处理党校招生、分配、编班等日常事务。他一般地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犯了一些错误，但不是安子文黑线上的人。

五七年反右斗争后，中央决定抽调一批干部加强高校工作。五七年十月戈华被调到天津师范学院（六〇年改为河北大学）在此期间：五八至六〇年，戈华积极领导了教育革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六〇至六三年暂时困难时期，当刘、邓黑司令部和社会上阶级敌人，

猖狂向党进攻时，由于戈华同志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改造，没有认清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戈华忠实贯彻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统战路线，并且有一些三反言论。

六三年三月由河大调来北大任第一副书记兼副校长。在北大期间，戈华与陆平在干部问题上有原则分歧，但是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等方面，没有多大分歧。特别在社教运动中，戈华由暧昧到坚定，并坚决支持了社教左派聂元梓、孔繁等同志。和彭真、万里、陆平黑帮作过比较坚决的斗争，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的，成为社教积极分子的核心人物之一。社教后，戈华同志受到陆平黑帮的排挤打击。五月二十五日前后，戈华同志坚决支持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贴出。张承先工作组进校后，戈华被提名参加了工作组的领导小组，只和崔雄崑一起搞行政工作。六六年八月河大师生贴出戈华的大字报后，戈华被编入陆平黑帮（按：所在的）的劳改队。一九六七年五月放出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校文革准备结合。由于戈华参加了井冈山兵团，随即被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抄家、斗争，戈华逃在外面，十二月初返京，被抓去严刑审讯，已达三月之久，至今仍未释放，下落不明。

戈华不是叛徒、不是特务、不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所以我们认为戈华可以参加学习班。请求（部队）首长处理这一问题。

首都红代会新北大井冈山兵团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下略）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 http://www.cnd.org/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